

运动员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的归因研究及启示

刘 留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 运动员的亲-反社会行为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往研究发现亲-反社会行为在体育比赛中经常出现, 能够对参赛者心理、身体产生积极或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对近二十年的国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 从共情理论、成就目标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三种理论视角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进行归因探讨; 其次, 以班杜拉的三方交互决定论为理论基础, 进一步分析运动竞赛中主体、行为、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提出亲-反社会行为的交互模型; 最后, 对现有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作出展望。

[关键词] 运动员; 亲社会行为; 反社会行为; 归因研究

DOI: 10.33142/jscs.v4i5.13987

中图分类号: G84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Attribution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Athle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U Li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pro anti social behavior of athlet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peop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rosocial behavior often occurs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can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of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first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explored the attribution of athletes' prosocial behavior from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mpathy theory,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econdly, based on Bandura's tripartite interactive determinism,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subject,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proposes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Finally, prospects are made for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athle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tisocial behavior; attribution research

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在运动竞赛中, 亲社会行为主要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的帮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的行为, 如祝贺队友取得好成绩, 对队友进行鼓励、帮助受伤的对手等。反社会行为则是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的伤害他人或对他不利的行为, 如对队友或对手的辱骂, 对手有意的身体侵害、辱骂嘲讽对手、比赛作弊等。我们经常看到体育赛场上的运动员会做出一些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比如在里约奥运会女子 5000 米半决赛中, 新西兰选手汉布林不慎摔倒, 随后带倒了身后的美国选手阿戈斯蒂诺, 而这位美国选手迅速起身, 并没有马上投入到比赛, 而是翻身将汉布林扶了起来, 感动了现场观众。当然, 体育赛场上也存在一些反社会行为的表现, 如澳大利亚板球队队员班克罗夫特在一场国际比赛中利用胶带黏附沙粒来打磨比赛用球的篡改球丑闻, 震动了板球界。上述案例中运动员所表现出的亲社会、反社会行为, 到底是运动员一时冲动还是理智选择? 目前还未有定论。因此, 本研究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 从共情理论、成就目标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三种理论对运动竞赛中亲-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探讨, 并基于三方交互决定论提出运动竞赛中亲-反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 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1 共情理论的解释

1.1 共情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共情是一种同时具有可选择性以及替代性地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 在个体适应社会生活, 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共情理论认为个体天生就具备对灾难、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 尤其是认为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他人的痛苦, 进而引发良心上的不安和自我反省, 由此还可能产生内疚感, 避免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在运动竞赛中, 共情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预测通常由道德认同和道德脱离两个变量反映。道德认同被认为是构成社会自我概念的一种认知图式, 能够反映出个体对社会普遍道德标准的认可程度。Kavussanu 等 (2012) 发现, 高道德认同感的运动员在看到被对手弄伤或严重伤害的运动员图片时, 会增加惊吓眨眼的次数, 这说明高道德认同群体比低道德认同群体会更多的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进而感到羞愧、痛苦、内疚和不安, 这一结果为运动员的道德认同和共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第一个客观证据。随后, Kavussanu 等 (2015) 又对参加足球、篮球、橄榄球、曲棍球等竞赛项目的 246 名大学生运动员 (男=160, 女=86)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道德认同与对手和队友的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 与罪恶感呈正相关, 也就是说具

有高道德认同感的运动员,他们在比赛时很少采取反社会行为,并且在故意犯规和伤害对手后,他们会感到适度的罪恶感。而那些表示在进行严重犯规后预期内疚感较少的运动员,则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可见,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共情来规范行为,形成道德认同。一旦个体的行为偏离了道德标准,就会产生内疚感和自我谴责感,从而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内疚感在此是一种共情的适应性情绪,通过该情感的共情机制可以控制道德认同感高的运动员较少地做出反社会行为^[4]。但是,对于道德认同感低的运动员,却可以通过道德脱离来规避共情。

道德脱离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认知机制,用于分离个体行为与其内在价值观,从而避免价值标准对行为的自我制裁。道德脱离机制可以使共情机制失去调节作用,让个体在做出非道德行为时,不会感到内疚。通过 Stanger 等(2013)对 251 名参加中高程度接触类竞技团体项目的大学生运动员进行调查发现,道德脱离与内疚感呈负相关,与反社会行为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具有高道德脱离的运动员可以通过减少预期的内疚感而增加比赛中的反社会行为。而且,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最常见的道德脱离机制是将反社会行为的责任归咎于他人(教练或对手),从而否定预期的内疚感,破坏共情的调节作用,促使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1.2 共情理论解释的局限

(1) 情绪共情对运动员共情发展的影响有待研究。一般认为,共情中包含情绪和认知两

种加工过程。人们通过“模拟”的方式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快速的模仿和复制,从而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被他人情绪所诱发的情绪唤醒,这个过程称为情绪共情。可见,情绪共情是建立在自我和他人相似性基础之上的“以己度人”,人们无法随意控制其发生和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由刺激驱动的自动化过程。而认知共情更多地表现出依据一套概念系统和规则,以理论的方式推理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在此过程中保持自我和他人表征的相对分离,并能够灵活整合这些表征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感受的过程。从现有研究不难看出,研究者更多的是从认知情绪的角度来讨论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共情机制,缺少对情绪共情的讨论。但是,在运动竞赛中运动员往往也会产生情绪共情,比如球赛中由个别球员引起的球队群殴事件。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解释。

(2) 不同情境可能对运动员共情发展有潜在影响。共情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它的发生往往与特定的情境相关。换言之,在共情过程中,个体需要充分利用当前具体的情境线索达成对他人情绪情感的准确理解,并产生与此类似的情绪体验。共情对象的社会身份以及由此与共情主体形成的群际关系是一种常见的情境因素,会影响到个体对他人的共情。当“他人”带有明显的“群体外”

或“群体内”特征时,由于群体认同感影响,个体的共情反应往往是不同的。在运动竞赛中的表现就是运动员对队友比对手更容易产生共情。Cikara 等人(2011)研究发现在一次棒球比赛中,球迷对自己支持球队失败结果的共情反映激活了扣带皮质前部和脑岛,对支持球队胜利结果的共情反映激活了腹侧纹状体(与主观愉悦有关)。可见,个体在看到“非本群体成员”的不良遭遇时往往感到开心,而不是产生共情。所以,群体一旦形成,他人的群体归属性质就会对个体的共情反应产生影响。除了群际关系以外,情境还包含情境意义性、真实性、公开性、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对于运动员共情机制有何影响,都需要进一步验证。可见,情境的复杂性也影响了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共情机制的复杂性。

2 成就目标理论的解释

2.1 动机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在众多动机理论中,研究者通常运用成就目标理论来解释运动员的亲-反社会行为。根据成就目标理论的观点,定义成功的参照标准分为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任务取向的个体更愿意通过提高自身工作能力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即通过自我定义成功;而自我取向的个体更愿意通过与他人比较展示自己的才能,即通过他人来定义成功。基于该理论,Duda 等(1991)认为在运动竞赛中,对于任务取向的运动员更可能关心技能的提高,并为此去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而不是采取欺骗或犯规的手段获胜。但对于自我取向的运动员,更有可能为了获胜而忽视对公平正义的关注。随后,Sage 等(2006)通过对英国足球俱乐部 210 名男性球员研究发现,在预测亲社会行为方面,运动员的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任务取向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取决于球员的自我取向水平。具体而言,只有当自我取向较低时,任务取向才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反之,自我取向水平较高时,任务取向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受到抑制。

随着成就目标理论不断发展,Allen 等(2003)提出通过任务取向和自我取向定义成功不够全面,还应该包括社会取向,它反映了个体对积极社会体验和发展互惠关系的关注。为此,Sage 等(2007)对自英国中部学校和俱乐部的 365 名青年足球运动员的多动机取向(任务、自我、社会)及亲社会行为进行调查。验证了社会取向与亲社会行为成正相关的研究假设。这说明比赛中的亲社会行为更有利于运动员建立相互满意的社会关系,一旦确立了这种关系,亲社会行为的受益者更有可能回报这一行动,从而加强联系,又为促进积极的关系创造了一种支持性的环境,但这种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更容易出现在队友之间而不是对手之间。

2.2 成就目标理论解释的局限

(1) 能力知觉可能对运动员成就目标取向有潜在影

响。根据成就目标理论,任务取向的个体更愿意通过学习掌握任务或提高技能获取成功,而自我取向的个体更希望通过付出最少努力超越他人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分别造成了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反应。根据 Grant, Dweck 等 (2003) 研究发现,个体在选择不同成就目标取向时隐含着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一般来说,每个人对自身能力的理解不尽相同,如果个体认为能力是可变的,就会倾向于通过获得知识来增进和提高个人能力从而达成目标,反之,如果个体认为能力是不可变的,那么就会通过比别人表现得更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可见,个体的能力知觉是影响成就目标取向的重要因素。那么,在体育比赛情景中个体能力知觉会不会进一步影响运动员的亲-反社会行为呢?比如,持有能力是发展观点的运动员可能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更多努力,提高个人技战术水平而得到展示,因此更愿意采取诚实的方式获胜。与之对应,持有能力是不变观点的运动员更多考虑如何超越对方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因而甘愿冒险采取一些不道德手段获得成功。这些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2) 教练员核心价值观可能对运动员成就目标取向有潜在影响。根据成就目标理论,成就目标取向被认为是个体社会化体验的结果,不同目标取向的个体对价值观也有不同的感知。通过已有研究发现,高任务取向的个体对公平、合作等价值观更加敏感。而教练员作为运动员重要他人的存在,其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对运动员的成就目标取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在日常训练中,教练员认为运动员应该为掌握和提高技术而训练,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运动员认为只要付出努力,成绩有了进步就是成功,就会增加运动员的任务取向。相反,如果在训练中教练员过度强调环境的作用,以获胜或取得好成绩为主要价值取向,就会增加运动员的自我取向。Saeed 等 (2020) 研究证明教练员强调不同的体育精神会对运动员的成就目标取向产生不同影响,模拟良好的体育精神预测了运动员会有更多的亲社会和更少的反社会行为。这些结论也支持了班杜拉的理论,即教练是运动员良好运动行为的典范。但是,教练员的核心价值观能否转化为运动员的个人价值观,以任务取向为主的成就目标是否有助于这种转化的顺利完成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3 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

3.1 环境(氛围)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氛围(climate)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运动员的行为,这一假说的提出是基于自我决定理论。Ryan 等(2000)认为,如果给予个体一个自主性的教养环境,他自然就倾向于成为亲社会的“动物”;而当个体缺乏这种教养环境时,他很可能通过追求名声或外在奖励目标来替代这种亲社会行为。Baard 等(2004)研究发现激励氛围往往是重要他人(教练员、队友、同龄人)在体育活动环境中所强调的目标和行为以及价值观,其中教练员具有重要的影

响力,当教练员为运动员提供自主支持的激励氛围时,运动员的自身感受得到认可,有机会展示主动和独立工作,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可以得到满足,因此往往会产生亲社会行为。与此相反,在控制性氛围的环境下,运动员更容易产生道德脱离,将反社会行为的责任转嫁给教练、队友或对手。Hodge 等(2015)对新西兰一所大学的 291 名竞技运动员的调查中也发现自主支持激励氛围与所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都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教练所提供的自主支持通过满足运动员的归属感和胜任感,并且间接预测运动员对队友的亲社会行为。由此可见,自主支持可以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他人,因此更有可能从事亲社会行为,而不太可能从事反社会行为。相比之下,控制氛围却使人们更少地关注他人,因此更有可能从事反社会行为,而不太可能从事亲社会行为。

3.2 自我决定理论解释的局限

(1) 不同文化可能对个体心理需求产生潜在影响。自我决定理论是基于人类有基本的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和整合倾向本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对于不同文化而言,满足心理需求的途径可能有很大差别。比如,在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群体中,人们往往认同群体标准,并且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因此只要个体将集体主义价值完全内化为自身文化,就会体验到归属感和自主感。反之,在强调个人主义文化的群体中,个体可能会遵从群体标准,但是个体也许会感到这些行为并不是自己的真实表达,自主感和归属感的需要并未满足。换言之,在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比赛团队中,即使教练员采用控制性氛围开展训练,只要队员们认可并内化这种文化,在比赛时也不一定会做出反社会行为。因此,在讨论不同激励氛围下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时,要充分考虑个体需求基础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动态深入地调查该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

(2) 竞争变量对激励氛围可能产生潜在影响。通常,体育运动被认为是零和博弈,即使使参与者的游戏相关利益呈现出对立状态。Shields 等(2011)从建构主义角度提出了竞争理论,其中两个核心原则就是:竞赛目标结构分为伙伴关系或敌对关系;参与者如何解释竞赛目标结构的目的将影响他们对比赛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当个体选择伙伴关系时,竞赛被解读为协作,比赛目的是利用竞争气氛来促进自我超越。当个体选择敌对关系时,比赛被解读为对立,比赛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为“一决胜负”。虽然运动员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比赛目的,但在现实情况下只有一个可以被激活和利用。换言之,即使教练员为运动员提供了自主支持激励氛围,但是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选择了敌对关系的竞赛目标结构,那么也有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因此,还要进一步探讨竞争变量对激励氛围及运动员亲-反行为的影响。

综上,通过共情理论、成就目标理论以及自我决定理论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理论解释发现,这些理论虽

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但还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其本质问题。而在社会认知理论中，班杜拉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论的思想模式，针对主体、行为、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辩证和完善的解释。因此，本研究尝试用该理论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及作用模型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4 三方交互决定论的理论假说

以班杜拉为首的社会学习理论家认为，人既不是单向地受内在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单向地受环境条件的控制，人的内部因素、行为和外部环境三者之间是双向地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人的认知、行为以及环境三者之间构成了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其中任何两个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模式，都随行为、个体、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果用 B、P、E 分别代表行为、主体、环境，环境决定论认为行为(B)是由作用于有机体的环境刺激(E)决定的，即 $B=f(E)$ ；个人决定论认为环境取决于个体如何对其发生作用，即 $E=f(B)$ ；班杜拉则认为行为、环境与个体的认知(P)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他同时反驳了“单向的相互作用”即行为是个体变量与环境变量的函数，即 $B=f(P, E)$ ，认为行为本身是个体认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副产品，即 $B: f(P * E)$ ，双向箭头表示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由此，建立了三方交互决定论因果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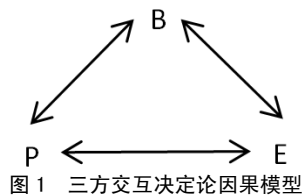


图 1 三方交互决定论因果模型

4.1 人的内部要素与行为的交互影响

(1) 人的内部要素参与行为的改变与创造。内部要素主要是指认知因素，它与行为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的。对于运动员而言，已经通过社会道德规范的学习以及自身比赛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对比赛场上道德行为的基本认知，建立并接受一定的道德标准，具备了对自己行为是否达到道德标准的评价能力。所以，当运动员预期自己的行为(反社会行为)与自我道德标准不一致，并且要为该行为负责时就会产生内疚不安、后悔与自责等消极情绪体验。此时，共情机制被激活，抑制了该行为的发展。但是，人的这种共情调节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从内部监控自己的行为，许多因素有选择地控制它的激活。对于道德认同感较低的运动员就会想办法寻找或制造一些理由，如“教练让我这么做的”“对手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他不是自己人”等借口，来支持自己的反社会行为，抑制这些反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共情机制。此时，运动员就在

利用道德脱离来支持反社会行为的发生。

(2) 人对行为结果的期待影响着行为。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人对行为结果的期待影响着他的行为，而行为的结果又反过来改变着他的期待。个人对自我能力的感知决定着追求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实现成就目标，而追求和实现的结果也同样影响和改变着他对自身的评估。对于运动员而言，如果他认为能力是可变的，并期望通过比赛提高自身的竞技能力(任务取向)，享受比赛的过程，体现对体育精神的诠释，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他往往就会选择遵守比赛规则，而不是采用作弊或讨巧的方式获得比赛胜利。而当他在公平竞争中获得成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认可的反馈后(社会取向)，就会继续维持这种行为。反之，如果运动员认为能力是不变的，只想通过比赛超过对手(自我取向)时，就可能采取作弊犯规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被发现并由此获得成功，就会激励他继续采取这种行为，比如足球和篮球比赛中的假摔王现象。

综上，在运动竞赛过程中，一方面，运动员的期待、信念、目标、意向、情绪等主体的内部要素影响着他对亲-反社会行为的选择；另一方面，亲-反社会行为预期产生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又部分地决定着他对道德行为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4.2 人与环境交互决定行为

(1) 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潜在因素。我们知道生活中除非人碰到炉盖，否则电炉不会烫手。这说明只有当某一行为被激活后，潜在的环境才能对人产生影响。在体育运动中，教练员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一个自主支持的激励氛围，在这里提倡相互帮助、肯定个人进步、追求体育精神等道德价值。但是，教练员提供的这种激励环境如要对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还需要满足运动员自愿参与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运动员产生自主动机，为了自己而重视或享受体育活动时，他才能通过自主体验内化这项运动，包括从战术到规则以及公平竞争等各个方面，并将参与比赛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体育参与的“所有权”也很可能延伸到内化规则、公平竞争和责任担当。与此相反，如果运动员感到自己受到内部压力控制，如内疚感或羞耻感，或害怕被惩罚等外部压力时，他们对获得外在奖励的渴望，不太可能将这项运动内化为自我天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更有可能将解决内部和外部压力视为参与比赛的唯一目的。因此，更有可能从事任何一种不良行为，甚至是反社会行为。可见，潜在的环境成为实际的环境，决定于人的行为。

(2) 人的内在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个体道德既源自个体，又源自社会，属于一种个体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人可以通过气质、性格等个体特征激活不同的环境反应，而不同的环境反应结果也影响着人对自我的评价，从而导

致人的内部因素的变化。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集体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对比赛中作弊和投机等反社会行为的态度水平有所不同。在大量运动竞赛中亲-反社会行为的案例中，不难发现足球、篮球运动员会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这是因为足球、篮球等直接对抗类的集体项目以主动控制空间为目标，以主动控制球为争夺焦点，比赛双方在场上直接攻与守相对抗，容易发生争执、产生摩擦碰撞。比如，在一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中，双方队员可能因争夺和冲撞而倒地次数在 200 次以上，比赛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在这种紧张对抗的环境下，那些对他人批评高度敏感的人，更容易感到被冒犯，在竞争中增加更多的愤怒和挑衅，也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员逐渐将这种行为作为个性特征的一部分而习惯化和无意识化，发展成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保存下来。

综上，在主体、行为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强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主体与环境这一对相互决定的关系则表明，虽然个体的人格特征、认知机能等是环境作用的产物，但环境的存在及其作用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潜在的，并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把握。可见，三方交互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一种理解方式，即一方面，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如将“比赛胜利”作为唯一的目标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去获得；另一方面，人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如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不仅需要运动员的道德认同，更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

4.3 亲-反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模型

通过文献资料及理论分析不难得出，运动竞赛中的亲-反社会行为是在特定情境下复杂的个人、情境和社会因素合并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些因素进行分类整合，明确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如图 2 所示，其中实线关系是已经验证的，虚线关系是有待验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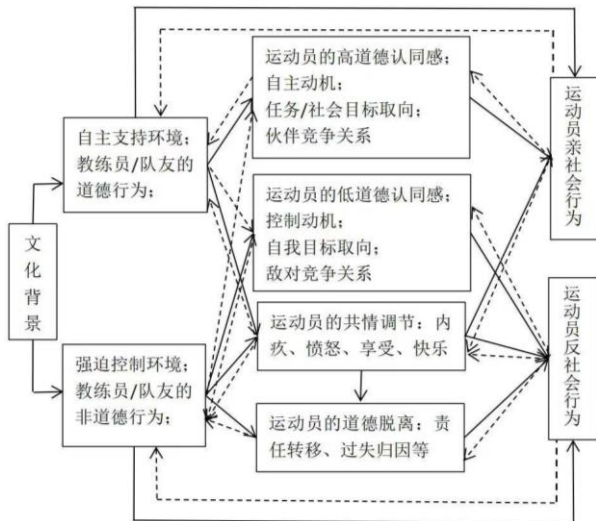


图 2 运动竞赛中亲-反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模型

5 结语

在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心理机制的探索过程中，研究者运用共情理论、成就目标理论以及自我决定理论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虽然还存在研究不足，但明确了共情、动机、环境等因素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为三方交互决定论假说运用主体、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全面解释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心理机制提供了研究前提。但是，根据 Kavussanu 等（2016）的研究发现，运动员对体育比赛道德困境与日常生活道德困境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们认为体育是另一个世界，一旦进入体育比赛，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责任可以被暂时中止，也就是运动员认为体育比赛中的亲-反社会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有区别的。这也对三方交互决定论假设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总之，随着人们对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该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会越来越清晰，也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运动员的比赛行为。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具身认知视阈下学校体育课程思政实践机制优化研究（课题编号：22YJA890012）

[参考文献]

- [1] 俞国良. 简明社会心理学[M]. 北京:开明出版社,2012.
- [2] Kavussanu M, Stanger N. Moral behavior in sport[J]. In P. Beek, R. Oudejans, & V. Hutter (Eds.), Special Issue in Sport Psycholog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16):185-192.
- [3] Brown R, Cehajic S. Dealing with the past and facing the future: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guilt and sham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8(38):669-684.
- [4] Aquino K, Freeman D, Reed A I I, et al. Testing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moral behavior: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situa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centra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97):123-141.
- [5] Kavussanu M, Willoughby, Ring C. Moral identity and emotion in athletes[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2(34):695-714.
- [6] Kavussanu M, Stanger N, Ring C. The effects of moral identity on moral emot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J]. Sport, Exercise and Performance Psychology, 2015(4):268-279.
- [7]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In W. M. Kurtines & J. L. Gewirtz (Eds.), 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M].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1.
- [8] Boardley I D, Kavussanu M.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ariabl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prosocial and

-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field hockey and netball[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09(27): 843-854.
- [9] Stanger N, Kavussanu M, Boardley I D, et al.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negative emotion on antisocial sport behavior[J]. *Sport, Exercise, Performance Psychology*, 2013, 2(2): 117-129.
- [10] Decety J, Lamm C. Human empathy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neuroscience[J].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06, 6(3): 1146-1163.
- [11] Kuzmanovic B, Schilbach L, Lehnhardt F G, et al. A matter of words: Impact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information on impression formation in high-functioning autism[J].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11, 5(1): 604-613.
- [12] Goubert L, Craig K D, Vervoort T, et al. Facing others in pain: The effects of empathy[J]. *Pain*, 2005, 118(3): 285-288.
- [13] Cikara M, Botvinick M M, Fiske S T. Us versus them: Social identity shapes neural responses to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harm[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3): 306-313.
- [14] Nicholls J G. The competitive ethos and democratic educatio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5] Duda J L, Olson L K, Templin T J. The relationship of task and ego orientation to sportsmanship attitudes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injurious acts[J].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1991(62): 79-87.
- [16] Sage L, Kavussanu M, Duda J L. Goal orienta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as predictor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functioning in male association football players[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06, 24(5): 455-466.
- [17] Allen J. Social motivation in youth spor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03(25): 551-567.
- [18] Sage L, Kavussanu M. Multiple goal orientations as predictors of moral behavior in youth soccer[J]. *The Sport Psychologist*, 2007(21): 417-437.
- [19] Grant H, Dweck C S. Clarifying achievement goals and their impac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3): 541-553.
- [20] Saeed K, Seyyede M, Shamila S, et al. A Social Learning Model of Antisocial Coaching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20, 64(8): 1-20.
- [21] Ryan R, Deci 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 68-78.
- [22] Baard P, Deci E, Ryan R. Intrinsic need satisfaction: A motivational basis of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in two work setting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4(34): 2045-2068.
- [23] Hodge K, Gucciardi D 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The role of motivational climat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15(37): 257-273.
- [24] Shields D, Bredemeier B. Contest, competition, and metaphor[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11(38): 27-38.
- [25] (美)班杜拉著;皮连生等译.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 社会认知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6] Luca M, Fabio L, Arnaldo Z, et al. Predicting moral attitude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young team sport athletes: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9, 49(4): 1-10.
- [27] Ponset F J, Cantalops J, Borrás P A, et al. Does cheating and gamesmanship to be reconsidered regarding fair-play in grassroots sports? [J]. *Revista de Psicología del Deporte*, 2018(27): 28-32.
- [28] Hagger M S, Polet J, Lintunen T.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applied to health behavior: Role of past behavior and tests of some key moderators using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18(213): 85-94.
- [29] Al-Yaaribi A, Kavussanu M. Consequence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adolescent male soccer play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tivational climate[J]. *Psychology of Sport Exercise*, 2018(37): 91-99.
- [30] Kavussanu M, Ring C.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in sport and student life: A study of bracketed morality[J]. *Ethics & Behavior*, 2016, 26(4): 267-276.
- 作者简介: 刘留(1979—), 女, 汉族, 博士, 副教授,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